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县级融媒体的角色定位与发展创新

吴占勇 张婧怡
（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44）

摘要：【目的】探索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县级融媒体应如何调试自身角色和实现创新转型，从而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方法】案例分析法和阐释法。【结果】县级融媒体应坚持深耕基层的角色定位，做国家发展话语的转译者、国家发展建设的参与者、国家发展成果的推行者。【结论】县级融媒体中心应以本土知识生产驱动内容建设现代化，注重凝合国家声音与本土经验，挖掘与弘扬本土文化价值，讲述社情民意与百姓故事。以技术思维驱动县级融媒体组织运营现代化，从连接思维、智能思维、融合思维三个层面进行运营创新。以激活群众参与驱动县级融媒体基层治理现代化，实现人的发展与社会治理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县级融媒体；知识生产；技术思维　**中图分类号：**G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34（2023）05-012-05　**DOI：**10.19483/j.cnki.11-4653/n.2023.05.002
本文著录格式：吴占勇，张婧怡．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县级融媒体的角色定位与发展创新 [J]. 中国传媒科技，2023（05）：12-16.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县域基层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广阔根脉，也是描绘中国特色发展画卷的生动来源。自 2018 年国家提出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战略以来，各地融媒体建设者因地制宜探索发展之路，在引导群众和服务群众方面形成各具特色的现实经验。那么，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已经完成初建探索的县级融媒体中心，该如何调试自身角色，如何实现创新性发展，如何深度嵌入现代化治理体系，从而助力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文章围绕以上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述。

1. 深耕基层：县级融媒体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的角色定位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现代化，广大县域基层的发展成果是检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质量的重要标准。县级融媒体应牢牢把握扎根基层的角色定位，在国家发展大局与基层社会建设之间发挥协调作用和推动作用，助力县域基层高质量发展。

1.1 国家发展话语的转译者与承引者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行动指南，具体到县域基层，大政方针如何有效传递给基层大众，如何在县域深入实施，是关系到国家发展质量的关键问题。

首先，县级融媒体应做好国家发展话语的转译者。无论国家施政方针，还是已获广泛检验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经验模式，均可视为蕴含着国家智慧的发展话语。县级融媒体作为上传下达的桥梁，其首要任务是将宏观的、方向性的、抽象的国家发展话语进行本土化转译，以符合当地群众接收习惯和思维特征的方式传播国家话语。更为重要的是，县级融媒体要将国家话语与本地发展实际、发展规划、发展重点相结合，站在本地百姓视角透视国家话语，做好政策解读，推广建设经验，为国家方针政策在本土落地实施提供智慧支持。

其次，县级融媒体应做好国家发展话语的承引者。承引，即承接和引领，在承接国家话语并进行转译的基础上，县级融媒体应从思想上引领基层社会高质量发展。引领方式有二，一是用基层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价值和深层含义，营造全社会高质量发展舆论氛围，二是深入动员基层大众参与社会发展建设，树立基层百姓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主人翁意识，为激活全社会发展创造活力。

1.2 国家发展建设的参与者与创新者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要义之一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县级融媒体中心不仅仅是媒体，更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最后一公里”，是基层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1 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北京文化遗产的视听传播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1XCC012）的阶段性成果。

治国理政的新平台。[1] 在我国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县级融媒体中心除了密切发挥“引导群众”的舆论功能，还需紧密围绕“服务群众”的发展宗旨，将服务与治理有机融合，在服务中优化治理，在治理中拓展服务，从而深度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

在技术哲学家看来，数字技术的发展将原本分开的系统和部分更为紧密地连接整合起来，构成了更为收紧的回路。[2] 相比大中城市，县域在发展建设资源方面相对有限，充分整合本地资源、巧妙衔接外部资源、激活本地人力资源，是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架构的县级融媒体在连接各方主体、汇聚不同资源方面独具优势，不仅能提供信息的共通与交流服务，还能够通过内容生产或举办社会活动等方式，在项目推广、电子商务、品牌传播、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

在参与地方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县级融媒体应寻求与政府各部门及社会机构的协同工作，实现地区发展动能的最大化。以数字技术升级为基础，县级融媒体应在舆论引导和提供服务方面开展积极创新，扎根县域经济文化发展实际探索特色业务，以创新驱动融媒体自身建设和当地高质量发展。

1.3 国家发展成果的推行者与优化者

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县级融媒体既是国家发展成果在县域基层的生动写照，又是向基层群众推广发展成果、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要载体。

首先，县级融媒体能够推动数字技术普惠大众的建设进程。基于数字技术，大众能够高效获得信息服务和社会服务。伴随数字乡村建设的持续推进，广大基层乡镇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县级融媒体则需要持续提供高质量的综合服务，让全民共享数字发展成果。

其次，县级融媒体是先进建设经验的推行者和扩散者。中国式现代化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中国特色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全国各地依据本土实际探索的多元化发展道路。县级融媒体通过积极推介各地先进发展经验、介绍前沿理念和方法，一方面能够为本土发展提供现实参考，另一方面推动各地发展经验交流互鉴，从中提炼高质量发展的更多智慧方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又是县级融媒体建设的不二准则。作为与基层百姓紧密连接的中枢机构，县级融媒体中心应积极建设百姓反馈渠道，将大数据分析与个性化反馈相结合，把握群众真正关心的问题，为相关机构优化工作思路和方法提供切实参考。

2. 以本土知识生产驱动县级融媒体内容建设现代化

知识生产是对特定研究对象进行描述和观察，以特殊视角对世界进行诠释的认知活动。[3] 中国式现代化是不断形成发展思路、经验和模式的过程，是党和国家与人民群众共同探索出的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知识集成。原创内容是县级媒体的核心产品[4]，作为基层信息的收集、诠释和传播者，县级融媒体在内容生产转型升级过程中，应着眼于对本土建设经验、本土文化价值、本土民间智慧的挖掘与呈现，形成富有地方特色和推广价值的知识内容，实现县级融媒体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深度互嵌。

2.1 凝合国家声音与本土经验，展现县域基层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国家政策与地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县级融媒体首先应紧密围绕县域基层如何将国家大政方针转化成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发展策略进行系列报道，做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呈现、记录与诠释。近年来，广大县域基层在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振兴等发展进程中形成各具特点的发展思路与举措，这正是基层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经验与智慧，是县级融媒体原创内容生产的不竭来源。

陕西省潼关县融媒体中心开设《乡村振兴看潼关》《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等栏目，利用深度新闻报道的方式展现当地乡村振兴故事、社会发展经验等，这是对基层地区发展思路的知识性提炼。同时，栏目注重对乡镇特色发展案例进行介绍，对其下一步建设方向进行展望，发挥县域媒体的公共讨论和决策咨询功能。贵州省关岭县融媒体中心则建立基层通讯员制度，由分布在县乡各地的通讯员及时把握基层动态和社情民意。

县级融媒体对本地发展历程与经验的呈现和传播，是融媒体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诠释对象进行本土知识生产的过程。从微观上看，县级融媒体的诠释是各具特色的实践性知识，但从宏观而言，基层诠释构成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宏大知识网络，不断造就和升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维度和理论内涵，这些正是县级融媒体内容生产的关键意义和升级方向。

2.2 挖掘与弘扬本土文化价值，展现丰富多元的中国式现代化图景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高速发展的物质世界需要有先进的思想和价值与之匹配。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价值，来自于中华大地丰富多元的文化传统和思想脉络，中

华文明既需要在深度挖掘中得到传承，又需要在时代化的价值诠释中得以创新发展。县级融媒体作为扎根基层的传播媒介，肩负传承本土优秀文化和诠释文化时代价值的历史使命，县级融媒体不仅要对本土优秀文化进行全方位挖掘与传播，还需要将本土文化思想嵌入中国式现代化版图中，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

县域基层的文化形成于各不相同的人文历史和自然环境中，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尤其是广袤的乡村地区，潜藏着华夏文明的悠久脉络。长期以来，对经济发展的追求使得全社会普遍偏向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这就带来乡村文明的黯淡与式微。然而，乡村文明是中华历史文化价值的根基，亦是当今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不竭源泉，在县级融媒体的内容版图中，对本土文化价值的挖掘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本土文化包含历史文化、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红色文化等多种形式。江苏省新沂市融媒体中心深挖本土红色文化，借助智能技术生产系列融合作品，如红色 VR 地图、《永远跟党走》沉浸式情景党课等。同时该中心打造特别栏目，以角色扮演方式让青少年与革命先辈跨时空对话，使观众通过当代人的口吻了解革命精神，以此将红色文化传播与时代价值诠释相结合，取得良好社会反响。

2.3 讲述社情民意与百姓故事，展现生生不息的中国式现代化活力

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的发展既是目的，又是过程，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追求美好生活的动态过程。县级融媒体的内容触角要伸进邻里坊间，覆盖中华大地，通过对基层百姓追求美好生活故事的讲述，描绘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图景，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与活力。

县级融媒体是百姓生产生活发展历程的记录者。河北省滦南县融媒体中心与县委宣传部协同举办“365百姓故事汇”，鼓励百姓诉说个人故事，无论《与病魔赛跑的村支书》还是《最美军嫂 铿锵玫瑰》，都是基层民众最鲜活的生活经历。甘肃省武山县融媒体中心则与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我的脱贫故事”短视频大赛及“新时代武山好少年”评选表彰，激发百姓主动记录并展示自己的生活故事，一段段生动的民间发展画卷由此展开。

县级融媒体是社情民意的反映者。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需要听群众之声、想百姓所想、急群众所急。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融媒体中心依托“蜀道昭化”App设立民生栏目，收集社情民意和百姓关心的问题，并联合政务部门妥善解决群众诉求。这将县级融媒体对社情民意的反映工作与其提供社会服务的功能紧密结合，体现了县级融媒体在基层发展中的现实价值。

3. 以技术逻辑思维驱动县级融媒体组织运营现代化

数字化技术给经济社会带来全方位和系统性变革，是县域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5] 伴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元宇宙、大数据、5G 等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已进入深度媒介化阶段。深度媒介化不仅要求社会主体能够运用技术开展生产生活，也要求社会主体具备技术思维，运用与技术逻辑相适配的思维方式进行社会实践。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县域基层信息技术的汇集地与行动者，站在以技术驱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背景下，县级融媒体从业者需要运用技术思维开展组织运营，由此才能带来基层媒体发展和信息传播的全面现代化。

3.1 连接思维：以平台嵌入整合传播资源

县级融媒体承担着助力基层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现实任务，虽然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县域基层，但上传下达、资源聚合、社会服务等功能的实现，有赖于县级融媒体不断扩大的传播声量。然而相比中央级和省市级媒体机构，多数县级融媒体在技术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等方面难言充实，尤其中西部偏远地区县级融媒体面临更为明显的资源桎梏。这时需要县级融媒体充分建立连接思维，通过平台之间纵向嵌入或横向联合等方式，巧妙借力，取长补短，实现传播效能的最大化。

对县级媒体建设基础相对薄弱的地方，可以采用“1+N”的多层分点架构进行资源整合。“1”是指省级媒体平台，“N”则指省内各县级融媒体中心平台，“1+N”能够将省级平台与县级平台进行对接，既能减轻县级融媒体的技术开发负担，也能够促进省、县的新闻信息输送与联合生产。例如湖北省打造了“长江云 + 云上市县”的“1+N”模式，在长江云开展的一次医疗救助直播中，直播内容被同步推广到云上市县系列客户端中，不同县区用户为当事人提供救助信息和物质支持，体现了“1+N”模式的强大连接作用。

对于经济发展状况良好、媒体建设基础相对牢固的地区，相近县域融媒体中心可建立密切的横向连接关系，共享经济发展资讯、共办地区社会活动、共创服务升级路径，多方联合最大程度激活区域发展活力。

3.2 智能思维：以智慧技术优化生产流程

麦克卢汉曾言，任何技术都循序渐进地创造出人生存的全新环境，这种环境并非消极的外在包装，而是一种积极的作用机制。[6]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不断更

新人类存在环境，ChatGPT 的面世引发人们对未来世界发展的多重想象。当 AIGC 愈加深刻地融入媒体内容生产，信息传播的模式将发生进一步转变。对于县级融媒体而言，引入最先进的智能生产技术并非一日可成，但追踪智能传播技术的前沿动态，以智能传播思维创新生产和运营方式，日渐成为县级融媒体工作者在信息时代的业务基本功。

当前国内县级融媒体在运用智能技术驱动生产流程重构方面积极尝试，在此过程中，省级技术平台的支撑作用尤为重要。借助省级平台提供的技术功能，县级融媒体能够在舆情监测、传播分析、热度排行、绩效考核等方面具有更强的管理能力，同时在汇聚新闻线索、把握生产进度、多元生成内容等方面更加便捷。

未来，县级融媒体在省级技术平台支持的基础上，可尝试与社会机构合作开展多样化智能生产合作。例如打造特色文化 IP，与相关技术机构合作推出虚拟数字人，宣传推广本地优秀传统文化，或与中央级、省市级媒体共同举办大型社会活动、公益传播活动等，借助上层平台力量拓展智能生产链条。

3.3 融合思维：以机制改革升级运营体系

融媒体中心是以现代传播技术为依托，对传统媒体运营流程进行颠覆式创新的产物。融合不仅意味着前端业务的重构，同时需要一整套运营体系的全面更新，而体制机制改革是持续困扰我国县级融媒体建设的难题。机制更新不只是出于业务生产转型的需求，其背后是融合思维对机构运营生态变革的现实需要。

在县级融媒体建设初期，不少地方出现“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问题，即县级融媒体依然延续原有传统媒体架构，并未进行人员、部门的重新架构。这样的设置一方面使县级融媒体不能顺利转入融媒体生产逻辑，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另一方面难以实现对全媒体传播和经营人才的培养。当前虽然各地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做出积极探索，但如何通过改革从根本上激发县级融媒体发展活力，依然是需要持续研究的问题。

体制机制改革一方面涉及组织机构调整，使部门架构更适用于融合生产，另一方面与激励机制相关，为人才的留驻和成长提供生态支持。县级融媒体可在省市级媒体的发展改革中寻求经验，例如浙江广电融媒体中心在挂牌成立后，取消了其前身传统媒体的部门设置，按照媒体融合传播的功能节点组建了 7 个全新部门。同时，中心建立起常态化新闻报道融合传播指挥调度机制，通过梳理各部门基本职能、协调运作方式，构建起全新的新闻采编运营链条。以此作为参考，县级融媒体中心需着力通过打破部门隔阂，厘清部门职能范围，使内部架构更适应融合时代的生产经营活动。

4. 以激活群众参与驱动县级融媒体基层治理现代化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宗旨的现代化，基层发展现代化则是以人民为实践主角的现代化。传播技术进步使得媒介在组织各阶层力量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中[7]，作用日趋显著。县级融媒体应激活群众对公共事务和基层发展的积极参与，实现人的发展与社会治理的有机统一。

4.1 统筹民间意见领袖力量，以传播参与助力基层自治

民间意见领袖不仅是向社会大众传播国家声音的重要网络节点，也是代表社情民意的中坚力量，对影响基层百姓的思想和行为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县级融媒体应在内容生产和活动组织中统筹民间意见领袖力量，邀请其参与融媒体的传播活动，发挥其与基层民众的心理接近性优势，推动党和国家声音的有效传达及对社情民意的动态把握，以此引导群众自治，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乡村地区通常是县域基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媒体传播“最后一公里中的最后区域”。近年来，随着乡村地区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现代农业的发展，不少具有城市生活经历的群体返乡创业，新农人是其中的主要代表。新农人是原来在都市生活或就业的人口，在自愿选择的基础上，拥有互联网思维和生态农业理念，以各种方式返回乡村，从事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创业群体。[8] 新农人为县域乡村发展带来崭新活力，是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有生力量。县级融媒体应重视新农人的传播潜力，将新农人纳入自身信息传播与反馈链条中，引导新农人发挥对基层社会发展的影响力，从而助力基层群众在参与式传播中对公共议题的关注与讨论，推动基层社会自治。

此外，通过有效的内容生产建设，县级融媒体能够为基层治理提供更多元的方式。北京市丰台区融媒体中心，将该区已有的“社区新闻发言人”制度搬到线上，并运用直播、短视频等手段对发言活动进行赋能与升维，大大丰富了群众讲好基层故事、传播主流价值的路径，使融媒体真正成为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纽带。

4.2 创新公共服务数字化建设，以新思路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要完成媒体的功能转型，需要县级融媒体的产品和服务做到垂直化、场景化、下沉化与智能化。[9] 服务群众与基层治理是县级融媒体发展的一体两面，只有为群众提供切实、高效、全面的服务，基层社会才

能形成更高等级的治理水平。公共服务包含政务服务、生活服务、文化服务等多个方面，服务创新不仅依靠技术的更新换代，还依赖于公共服务工作思路的转变。

山东省宁津县推动县级融媒体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协同共建，将媒体数字技术服务和线下文明实践服务相结合。全县一千余支志愿服务队伍“驻扎”智慧宁津手机客户端，为群众提供常态化服务项目。在该县部分地区，智慧宁津客户端能够实现对志愿服务活动的调度、监控、传播与测评。这一做法有效规避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提供线上数字服务方面的技术短板，采用线上与线下互补、“两个中心”互补的方式，为基层百姓提供多样化的社会服务。

当前，越来越多县级融媒体中心与当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服务中心（简称“三中心”）等开展合作，在相互融合中推进地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发展。从2016年挂牌至今，江西省分宜县依托“画屏分宜”客户端，在社会服务方面形成了群众“点单”、“三中心”“派单”、志愿者“接单”、群众“评单”的工作闭环。“三中心”协同工作充分调动了县域基层的群众力量，高效融合了数字技术与社会服务，对于增强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4.3 整合基层社会建设资源，以协同手段推动社会发展

县级融媒体是信息汇集的平台，因而能够聚合各方信息资源和商业资源，辅助资源主体实现特定目的。基于县级融媒体自身的公信力和专业性，融媒体中心能够整合基层社会发展资源开展电商营销、品牌传播、社会公益等活动，成为县域发展的重要行动者。部分县级融媒体逐步探索多方合作、协同发展的路径，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果。

“长城联盟”是由浙江安吉新闻集团与河北省正定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发起成立的媒体联盟，目前有数百家县级融媒体中心成为联盟成员。安吉新闻集团开发的“游视界”App、网站、小程序等，充分利用区块链技术打通不同县域间的合作，在联盟内被广泛使用。作为一个共建共享平台，通过“游视界”的线上线下体系，各地融媒体中心将当地产品置入平台“精选特产”选项下，用户便能够直接下单购买，并且平台支持直播带货等电商服务。

此外，“游视界”还能实现联盟成员的旅游资源共享。联盟成员可在平台“人气景点”“攻略分享”页面编辑发布当地特色景点及相关攻略，平台用户则可接收所有地区的景点推荐与攻略分享，这对联盟成员当地的旅游业发展形成拉动作用。通过县级融媒体之间的联合与协作，各地商业、旅游、文化资源等能够高效聚合，为推动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助益。

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县域基层百姓的生活质量与发展水平，是衡量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程度的关键指标。县级融媒体是中央与基层上传下达的桥梁，是汇聚多方发展资源的中介，是记录基层现代化发展的载体，紧密围绕扎根基层的角色定位，县级融媒体应持续推进对内容的创新生产、对技术的创新应用、对群众的充分调动，由此才能真正助力基层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国家建设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参考文献

[1] 陈国权，迪丽・美拉．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新坐标与新趋势[J]．新闻论坛，2022（3）：50–53.

[2] [澳] 斯科特・麦夸尔．地理媒介：网络化城市与公共空间的未来[M]．潘霁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18.

[3] 董天策，陈彦蓉．县级融媒体的知识生产：基于文献计量的知识社会学分析[J]．现代传播，2022（5）：43–50+94.

[4] 李彪．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发展模式、关键环节与路径选择[J]．编辑之友，2019（3）：44–49.

[5] 余飞．县级融媒体中心实施系统重置推进深度融合转型[J]．中国传媒科技，2022（11）：98–101.

[6] [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0.

[7] 吴占勇．发展传播学视域下乡村文化振兴的短视频实践策略探析[J]．中国出版，2022（11）：34–39.

[8] 张慧泽，高启杰．新农人现象与乡村人才振兴机制构建——基于社会与产业双重网络视角[J]．现代经济探讨，2021（2）：121–125.

[9] 胡正荣．打造2.0版的县级融媒体中心[J]．新闻界，2020（1）：25–29.

作者简介：吴占勇（1988–），男，河南郑州，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视听文化传播；张婧怡（1999–），女，河北邢台，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李净）

